

论西方哲学的三次转向

向 达

(陕西理工学院 经济与法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摘 要] 西方哲学史上有三次著名的转向: 伦理、认识和后现代。这三次转向与主体有着深刻的关系。伦理的转向将人从自然中独立出来, 成就了人的主体; 认识论转向形成主客二元对立, 将人异化; 后现代的转向意在消解理性的主体, 实现真实的存在。然而主体的命运究竟何去何从, 还有待历史的界说。

[关键词] 主体; 伦理; 认识论; 后现代

[中图分类号] B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0)05-0033-05

主体是西方哲学的主流范畴, 它承载着西方人的命运。然而作为一形上的范畴, 其产生、发展、演化皆表现了深切的历史情结。透过历史的镜像, 可以把握主体嬗变的脉络。当人从蒙昧的神话意识中挣扎出来时, 自然成了人们急待认识与征服的客体, 然而在前苏格拉底阶段, 人们只是默默地做着这种工作, 缺乏对主体的理性自觉。中世纪的神学至上论将主体消隐在神的光环之中。文艺复兴发现了人, 发现了自然, 主体性日益彰显, 但却伴随着主体的异化, 于是后现代主义有人惊呼“人死了”(福柯)。这似乎印证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 无——有——无。

一 伦理学转向

西方哲学的伦理学转向可以苏格拉底作分水岭。前苏格拉底哲学以自然哲学为主, 其特征是对自然——特别是宇宙生成论——的关注。此期的人们思维具有神秘主义的蒙昧色彩, 还保留了原始氏族似的对自然的畏惧与惊恐, 因此人们急待认识这个客体, 以消除对一种异己力量的焦虑。这种迫切的任务, 使人们还无暇顾及自我的存在, 至少还没上升到自觉的层次。

可将前苏格拉底哲学概括如下:

1. 此期的自然哲学体现了一种直观朦胧的思维特征, 其对宇宙生成及自然结构问题的思考具有很大的猜测成分和神秘色彩。这种思维特征缺乏现代西方自然科学思维的强烈的主体意识。

2. 此期的自然哲学是原始思维的沿袭, 是人对自然压迫的积极回应。

3. 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和相对于近代科技的超功利性, 它表现了主客合一的一元文化倾向, 具有“人在自然中, 自然在人中”的特征。

4. 这种直觉的一元的蒙昧特征与中国传统文化有颇多相似之处。例如中国当时的文化即用一种蒙昧的直观的思维描述宇宙生成问题。如《易经》用阴阳二气的互动说明宇宙生成。《尚书》中也有五行生成论记载。这与西方的“水”说、“火”说、“气”说、“元素”说等何其相似。

5. 西方早期的这种蒙昧的科学精神后来成功地提升到自觉的理性层面, 而中国的文化却没有。其根源也许在于西方有逻各斯(logos)的理性基因。有史可考的逻各斯思想是由赫拉克利特提出的, 这对西方日后的文化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中国早期即缺乏这种逻各斯基因。

到智者学派时期, 随着古希腊的繁荣及民主的推进, 社会问题日益凸显, 这对人们如何认识自我提出了挑战, 也为其文化的“伦理学转向”提供了历史的契机。

由于古希腊的强大和繁荣, 手工业和商业发展迅速, 商品经济日益发展, 使其成功地完成了从农业文化向商业文化的转型。商业文化是一种本能地呼唤主体性的文化。因为市场的经济行动需要主体独立参与和选择, 而且其公平的内在需求也要求个体的主体性彰显。

古希腊进入文明社会的过程中, 成功地瓦解了氏族宗法血缘关系, 使个体从温情脉脉的宗法群体关系中解脱出来, 成为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的自由主体。这种对血缘的瓦解在古希腊史中随处可见。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中说到一个“俄瑞斯忒斯”的故事。希腊远征军统帅阿伽门农回来后, 被其妻子伙同其奸夫谋杀。其子俄瑞斯忒斯为报父仇把其母和奸夫杀死。复仇女神认为其杀母犯大逆之罪, 于是起诉他, 但阿波罗却极力为俄瑞斯忒斯辩护, 认为俄瑞斯忒斯的母亲杀死的是其没有血缘关系的丈夫, 按正义的法治原则也该论罪, 所以俄瑞斯忒斯是替邦行义当无罪。结果审判长雅典娜宣布俄瑞斯忒斯无罪^[1]。

[收稿日期] 2010-09-30

[作者简介] 向达(1976-), 男, 湖南湘西人, 陕西理工学院经济与法学院副教授。

法治原则为主体的解放提供了保障。在苏格拉底时代,雅典的民主与法治思想盛行,法治本质上呼唤自由的主体,而人治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苏格拉底在法庭中曾跟一个起诉人聊过天。该人起诉的是其父亲,因为他把他的仆人打死了。这种事情在中国就是大逆不道。中国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情大于法。叶公对孔子说:“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回答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其为父隐——一直在其中矣。”^[12]孔子认为亲亲相隐才是所谓的正直,这显然把血缘之情放在法规之上。而伦理血缘是消解主体的天然手段。

民主内在需要具有自我意志的主体参与。在会议的辩论中,公域的演说中及投票表决中都需要主体的自由选择,这就使人们的主体性越发凸显。智者的教授事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由于政治、经济的繁荣及其对具有主体性的公民的内在需求,加之人与人之间关系日益复杂,使人们对“人”越发关注。智者普罗泰戈拉声言:“人是万物的尺度。”^[13]这句话隐射出雅典人自豪之情,也内在反映了那个时代特征:自然特别是社会的问题需要具有主体意识的人去解决,在此过程中彰显了人们的主体性。当然这也为主体性提出了要求: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万物的尺度?这使“认识你自己”成为迫切的问题,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有二联,其一为“选择适度的行为”,其二为“认识你自己”。

苏格拉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出场的。他总结了以往的哲学思想,将哲学的基本任务定格于“对德行的研究”^[14]。这就是著名的“知识即美德”的命题。德行当然是人的,故苏格拉底大力呼吁“认识你自己”,这就从理性的角度提升了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及德尔斐神庙“认识你自己”的命题,将其上升到自觉的哲学思考的高度。正如黑格尔所言:“(苏格拉底)不仅宣布人是万物的尺度,而且宣布作为思维着的人是万物的尺度。”^[15]

苏格拉底完成了西方哲学的伦理转向,被誉为西方“伦理学之父”,其特出的贡献在于将理性(逻各斯)和自由(努斯)的精神镶嵌在主体对自我的思考之中。这就开启了西方形而上学主体论的先河。成为往后西方哲学绕不过的一道坎:近代认识论的主体,现代存在论的主体,后现代欲解构的主体等都是在苏格拉底所开创的伦理主体的话语背景下展开的。

当然古希腊的伦理学转向并不是说人们放弃了对物质世界的思考,而是说人们将对“自我”的思考置于前者之上,更加关注主体性问题,使理性与自由的意志更多应用于伦理及其与之相关的政治、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人的本质是什么”、“人应当怎样生活才是幸福”等基本问题之上的。这使西方深深打上了伦理主体的烙印,即使是超功利的科学思考都难说是纯粹地超功利,因为自由思考可以给主体带来精神的愉悦。据说亚历山大大帝很欣赏犬儒学派哲学家第欧根尼,拜访他并问他有啥要求,第欧根尼把手一挥道:“莫挡我的阳光!”他宁要灵魂的安宁和自由的思考也不要荣华富贵,因为他认为这更幸福^[16]。

二 认识论转向

认识论的转向发生于近代,与文艺复兴有很大的关系。文艺复兴有两大发现:人的发现和自然的发现。人的发现实质是人们对古希腊的理性和自由的复兴,这种理性与自由体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人成了一个超越神意的独立自由的理性主体。自然的发现使其成为自由主体的客体。这为二元论的认识论哲学创立提供了契机。

近代的认识论转向具有强烈的功利目的性。整个文艺复兴是在资产阶级蓬勃发展欲突破旧的生产关系、思维模式下进行的。理性和自由的复兴及自然的发现为新兴阶级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认识世界以利用之成为一项迫切的时代课题。这种课题催生了主体性的积极彰显,以致于形成“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在决定对待自然的方式时,人类的欲望及其满足是唯一值得考虑的东西……自然物被看作完全是可依据我们的目的加以使用的‘它’”^[17]。这就使自然从养育万物的“母亲”变成“任人宰割”的“材料”^[18]。

认识论的转向在伦理功利的前提下蕴含了深刻的科学理性精神。认识首先是对作为客体的自然的认识,主体正是在这种认识中发现和肯定自身价值的,这就使科学理性的精神得到蓬勃发展。而哲学的任务自然就定格于科学理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这一点不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都得以充分体现。

培根后半生致力于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思考,出版了《新工具》、《论科学的增进》等相关著作。他说:“必须给人类的理智开辟一条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道路,提供一些别的帮助,使心灵在认识事物的本性方面可以发挥它本来具有的权威作用”^[3] 39”。他很强调知识(真理)的重要性,认为知识就是力量,因此科学的任务在于发现自然的规律。在何以可能认识自然规律方面,他认为首先要排除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假相和错误观念——种族假相、洞穴假相、市场假相和剧场假相;其次人们应排除感情意志和感官迟钝的阻碍;第三,应用实验和科学法归纳法作为取缔逻辑的新工具,因为“经验主义者好像蚂蚁,他们只是收集起来使用。理性主义者好像蜘蛛,他们从他们自己把网子造出来。但是蜜蜂则采取一种中间的道路。他从花园和田野里的花采集材料,但是用他自己的一种力量来改变和消化材料。真正的哲学工作也正像这样。”^[3] 358。弗·培根显然继承了中世纪末唯名论者的思想,趁着文艺复兴的历史潮流,将人的主体性定格在对客体的认识方面,这种思想比笛卡尔稍早。

弗·培根是英国经验主义创始人,而笛卡尔则是欧陆唯理论的鼻祖。笛卡尔的毕生工作都致力于科学及其方法的思考。他创立了解析几何学,著作有《谈方法》、《形而上学的沉思》、《哲学原理》等,与培根不同的是笛卡尔更强调主体的思维(或意识、理性)在认识自我中的作用。他说:“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9] 148。他还在《第一哲学沉思录》中说:“严格地说来,我只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者一个理性。”^[10] 25-26。笛卡尔在此将主体的本质界定为思想着的精神,甚至是自我存在的基础,即“我思想,所以我存在”^[9] 369。

这样,主体的思想上升为哲学的第一条原理,因为只有思想的主体是存在的,而且这种存在是不容怀疑的,这一原理成为知识的起点。

笛卡尔显然“复兴”了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主体的思想才是真实的存在,而客体的现象则是虚幻的。“我赖以成为我的那个心灵,是与身体完全不同的,甚至比身体更容易认识,纵然身体并不存在,心灵也仍然不失其为心灵。”^{[10]36}在此,笛卡尔设计了两个不同的世界:理念与现象。虽然主体可以骄傲地在思想的世界中对客体进行认识,但主客二元分立的模式却导致了主体的异化,对其存在产生了巨大的威胁。

康德沿袭笛卡尔的思路,将“我思”定格为“综合的先验统觉”,他认为“自我”是先验的不可知的,人们只有遵循自我中的先验普遍法则。在这里,主体进一步被膨胀,人凭借其先验法则不仅能为自然立法而且能为自己立法。“人是目的”,康德说。这一命题显然沿袭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反封建专制和宗教压迫的思路,将理性和自由的琼浆玉液注进人类枯萎的身躯,使人获得一种为我而活的勇气。

康德对人的拯救虽然动用了辩证法的思路,但不彻底。他强调人的主体性意涵,主张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使生活充满意义,但这种自由的努斯精神还停留于形式逻辑的二元论窠臼之中。他将世界分为现象与物自体,现象界服从必然法则,物自体界服从自由法则,两者之间不能贯通,也即不能运用现象界的认识法则去认识物自体,物自体是不可知的。这种不可知性正是人得以为人的根基所在,即自由成就了自我,理性成全了他我,二者使主体获得了完满的意义。所以康德对人类弃恶向善的旅途充满了信心,世界大同和永久和平尽在期待中。

黑格尔接过康德的文化接力棒,将理性和自由演绎成绝伦的绝对精神,于是整个人类的历史便成了绝对精神的发展史。绝对精神的实现便是理性和自由的实现。在方法论上,黑格尔运用了辩证逻辑,超越了形式逻辑。这种辩证逻辑认为世界的发展源于实体内部的矛盾性。即“自否定”,然后通过“否定之否定”而产生质变,事物就是这样螺旋式上升,摆脱了形式逻辑的循环发展论。主体在辩证逻辑里获得了生命力,他与超人仅一步之遥了。至此,理性的主体已臻极至,它要接受批判的挑战了。

认识论的转向将主体灌注了理性与自由的灵魂,使之膨胀乃至僵化,其结果便是导致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主体的异化,形成单向度的人。存在的烦恼形成了。正如里克曼所言:“我的自由之感到焦虑是因为它成为诸价值的基础而自己却没有基础。”^[11]上帝死了,凶手是人,现在,这把疯狂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又将剑锋对准了自身。他的精神开始分裂了,或曰这是黑格尔辩证逻辑“自否定”的上演。“在人的主体理性的狡黠中,又一次发生了主奴颠倒,人变成了没有主体个性,没有自我,只是执行机器功能的部件和工具。”^[12]主体成了自身的奴隶。

三 后现代转向

认识论的转向成就了理性的主体,当然自由也是其追求

的基本价值。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助长了理性的权威,致使理性几乎成了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代名词。“从笛卡尔起,贯穿着整个启蒙运动及其后继者,所有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都推崇理性,把它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源泉,视为真理之所在和系统性知识之基础。”^{[13]3}理性精神已渗透进社会各个层面,成为无冕之王。当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大唱理性赞歌时,人们其实是把它当作抵制封建专制与宗教的压迫,当作一种“成人”的手段。但当资产阶级取得革命的成功后,理性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外化为主体的异质,于是主体的另一维——自由——便失去存在空间。正如福柯所言:“(主体)既可能由于统治或依赖关系而受制于他人,也可能由良心或自我知识而受到……自身认同的束缚。”^{[13]6}在福柯的语场中,这种“自我认同”显然是生物性权力规训的结果。人们将理性交给权力,然后将主体交给理性,于是“人死了”。

为了拯救这个重危的主体,必须在现代场域中对理性的主体作消解,这就是西方的后现代转向。后现代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从字面理解当然为“现代之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建议用“后——现代”来描述西方历史从 1875 年以来的第四个阶段。后现代理论错综复杂,流派纷呈,很难统一概说。福柯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包括话语、制度、建构形式,管理政策、法律、行政手段、科学陈述及哲学、道德和慈善事业——一句话,不可胜数的一切——在内的完全异质的综合体。”^{[13]34}乔治·斯坦纳认为后现代将会导致:(1)地理和社会中心的丧失;(2)不再相信进步是历史的发展轨迹和目标,对未来持晦暗悲观态度;(3)对那种相信在自由——人本主义原则和道路行为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的现代主义信仰的怀疑^{[13]15}。总之后现代是对现代的反思、批判与超越。后现代学者力图通过不同的手段挣脱理性的枷锁,寻回丢失的自由主体。这种主体是摆脱理性场域的主体,要通过否定主体来寻回主体,这是主体的自否定。因此后现代者极力消解理性及其主体,从“别处”寻找自我,这种别处主体体现在存在与语言的转向。

在存在与语言的转向之前,必须先谈下尼采。尼采首先对西方传统价值系统提出了质疑,其力作《权力意志》的副标题便是“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康德曾沿袭启蒙的思路呼吁对其以前的价值进行理性的审判,尼采是进行审判的审判,重在推翻以理性为核心的旧的价值体系。它认为西方的理性传统抽空了人的精神,造就了没有个性和创造力的人,这样的主体他讥之为“群畜”。“我的问题:迄今为止,人类在道德,或道德的道德性方面受过什么损害呢?损害了精神等等。”^{[13]636}思想启蒙运动,是一种必要的手段,使人变得更无主见,更无意志、更需要成帮结伙。简言之,在人们中间促进群畜的发展。”^{[13]37}尼采大胆地质疑了传统主体的合法性,认为那样的主体不配,提出“‘人类’不是目的,超人才是目的”,^{[13]25}用超人取代群畜。超人才是称职的主体,才配成为世界的主人。在此,尼采以惊人的力量瓦解了康德的道德体系。

尼采的哲学批判为后现代超越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

提供了理论基础,为主体的消隐和语言的转向开启了大门。“尼采对西方哲学基本范畴所作的深刻犀利的哲学批判,为许多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批判提供了理论前提。……他坚持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是隐喻,主体只不过是语言和思维的产物而已。”^[13] 他对传统的基本范畴如主体、再现、因果、真理等与理性有关的价值大加挞伐,认为艺术比理论更能提升生命,非理性比理性更贴近存在。

胡塞尔看出了传统认识论的重要二元对立及唯我论的陷阱。于是提出哲学的研究任务应回到“事物”本身。但他的这个“事物”却是“先验自我”,它是通过“先验还原”产生的。先验自我是一个纯粹主体,是一个能动的充满了创造性和决定力量的自我。通过这样的演绎,胡塞尔将哲学研究从“客观性”转变为“主体性”,他自诩为这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这种先验自我因太强的意向性而陷入了唯我论的深渊。胡塞尔对此深有觉察,他反思道:“当我这个沉思着的自我通过现象学的悬搁而把自己还原为我自己的绝对先验自我时,我是否会成为一个独存的我?……因而,一门宣称要解决客观存在问题而又作为哲学表现出现象学,是否已经烙上了先验唯我论的痕迹?”^[14]于是胡塞尔开始了对自我的消解。他将先验的自我从神龛拉到人间,放在一个开放平等的经验世界之中。这个世界不仅有先验的自我,而且有“先验的他我”,自我和他我是平等的共在,他们构成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先验交互主体[即主体间性]是绝对的,它是惟一自主的存在始基,所有客观性从其而来,是客观实在的存在物的大全,但它也是每一客观精神世界的绝对,是其意义和所探寻的有效性。”^[15]

海德格尔企图通过存在论来解决胡塞尔的主体性悖论,通过存在论,将认识的主体消解。海德格尔认为传统的认识论将主体定格为一个认识的主体,太过强调其自我意识与精神,结果陷入唯我论和人类中心主义。这种主体忘记了存在,实质是一种异化,失却了人之本质意义。“存在先于本质”,海德格尔说。人首先是作为此在的存在,而不是一种枯燥的认识工具。“海德格尔对此在分析所揭示出的,并非一个认识的主体,而是一个既被抛又进行筹划的存在。”^[16]此在是一个为自我的存在,其存在过程构成了存在本身。那是一个积极创造充满活力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固定的存在物。“此在的本质在于他的存在。这个存在者为之存在的那个存在,总是我的存在。”^[17]此在通过在世之在达成与他(或他人)的共在。在此,海德格尔完成了其师胡塞尔主体间性的意趣。

海德格尔后期关注了语言,认为语言承载了存在。他说:“当人思索存在时,存在也就进入了语言。语言是存在之家,人栖居于语言之家。”^[18]这种思想为福柯和德里达通过语言的方式来消解主体——“人之死”或“人之终结”——开辟了道路。

福柯批判近现代的人本主义,认为这种主体的凸显抹杀了人的精神,人的精神在人类学中沉睡了。为了唤醒这种沉睡的精神,必须要消解大写的人,主体与语言不能并存。福柯发现了话语的消解力量。他发现“人在古典知识内部并不

存在。存在是能表象物之本的话语所特有的权力,为研究语法或财富体系,并不需要通过人文科学,而只需通过话语。”^[19]于是他运用知识考古学与系谱学的方法,将主体消解于知识型的话语之中。这种消解意味着人本主义的主体特权的消失,只有作为存在之家的话语存在。在福柯的视域中,主体与上帝一样是压迫的根源,他们构成了中心与基础,使人的精神失去活力。因此上帝之死内含着人之死。他说:“尼采表明上帝之死不是人之出现,而是人之消失,人与上帝有奇特的亲缘关系,因为人与上帝同时是孪生兄弟和互为父子关系:上帝死了,人不能不同时消失。”^[20]所以,人或曰主体并非永恒的存在物,他的存在受不同历史时期知识型的影响,随时有被抹杀的危险。在《词与物》的结尾,福柯断言:“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21]

德里达的语言学解构的旨趣在于批判语言的二元对立——语音与文字。他认为语音中心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也是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到索绪尔的理性主义传统。这种理性主义传统助长了主体的霸权,形成“暴力的形而上学”,也是欧洲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罪魁祸首。德里达因此痛恨“在场的形而上学”。于是力图通过文字、文本消解主体,因而实现“人的终结”。

古希腊的“伦理学转向”发现了人的价值,把人从自然中独立出来,人实现了自己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蕴含了逻各斯(理性)和努斯(自由)的精神。人们将对自然的思考与对自己的思考统一了起来,主体享受了自由的欢悦。近现代的认识论转向将理性外化、模式化,并以此规范主体,造成了对自由的压迫,从而使主体异化,沉闷了人们的生活,分裂了主体的精神,导致了后现代的转向。后现代转向目的是消解这种异化的主体,并不是真正消解主体性。但不管是尼采的超人,胡塞尔的先验自我还是海德格尔的此在与共在亦或福柯的话语及德里达的文本,都不能给主体一个温馨的家,主体还在流浪。

[参考文献]

- [1] [德]古斯塔夫·施瓦布.古希腊古典神话[Z].曹乃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5:530-536
- [2] 程昌明译.论语[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143
- [3] 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4] [古希腊]色诺芬尼.回忆苏格拉底[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5
- [5]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M].贺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66
- [6] 邓晓芒.中西文化比较十一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389-390
- [7] [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43
- [8] 贺来.价值秩序的颠倒与现代社会的命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6):7-13
- [9] [法]笛卡尔.方法谈[M]//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

国哲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5

[10] [法]笛卡尔. 第一哲学沉思录[M]. 庞景仁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11] [英]H. P 里克曼. 理性的探险[M]. 姚休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73

[12] 王振林. 从主体理性的凯旋走向理性主体的黄昏[J]. 社会科学战线, 2003(5): 231- 234

[13]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 斯蒂文·贝斯特. 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M]. 张志斌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14] [德]胡塞尔. 笛卡尔式的沉思[M]. 张廷国译,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1: 122

[15] [丹麦]D 扎哈维. 胡塞尔先验哲学的交互主体性转折[J]. 臧佩洪译, 哲学译丛, 2001(4): 2- 9

[16] 莫伟民, 姜宇辉, 王礼平. 二十世纪法国哲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716

[17] [德]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8 42

[18] 赵敦华. 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113

[19] MichelFoucault “ lesmoe setles choses”, D its it ecits I 1954- 1969, 1966 501

[20] 莫伟民, 姜宇辉, 王礼平. 二十世纪法国哲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487

[21] [法]米歇尔·福柯. 词与物[M]. 莫伟民译, 上海: 三联书店, 2001 506

Three Turns ofW estem Philosophy

XIANG Da

(Shanx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nzhong 723000 China)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three well- known turns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ethics, knowledge and post- modern. The three turns have profound relationship with the subject. Ethics turn separates human from nature to achieve the main body of the people; epistemological subject and object shift the formation of binary opposition, which leads to the human alienation; post- modernism is intended to digest the main body of rationality to achieve real existence. However, what is the fate of the main body and where to go need to be defined by history.

Key words subject, ethical, epistemology, post- modern